



CHINA NEWS DIGEST — CHINESE MAGAZINE (CND—CM)

• — • — • 中国新闻电脑网络 (CND) 主办 • — • — •

—— 增刊 第七一二期 ——
(二〇〇九年八月三出版)

本期目录 (zk0908a)

【人物探索】	文革新星戚本禹的的跃升与殒落	丁凯文
【不堪回首】	邓拓自杀前的抗争	钱 江
【口述历史】	“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王宇英

小启：本期通讯所刊载的材料已经全部增补到网上《文革博物馆》“最新展出厅”及各有关“展厅”，欢迎前往参观。

文革博物馆》网址：<http://museums.cnd.org/CR>

欲订阅本刊《文革博物馆通讯》请致函 cnd-info@cnd.org 获取订阅资讯。

来稿请投寄 tougao@cnd.org。请在 subject 中标明 CR 字样。

【人物探索】

文革新星戚本禹的的跃升与殒落

• 丁凯文 •

文革中政治新星戚本禹是曾经叱咤风云的“戚大帅”。戚本禹相对于其他同龄人而言，可说是少年得志，早早就进入了“中国最高权力中心”——中南海，虽然谈不上日日受中共精心的培养，但却是近水楼台得到中共领袖思想风范的熏陶，自是普通老百姓所无法期盼的。再加上戚本禹先天聪颖，后天刻苦，为自己奋斗出一番可观的天地。文革初期的戚本禹年纪轻轻即跻身“中央首长”之列，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之一，其声势如日中天，实乃一颗迅速跃起的政治新星，然旋踵之间却急速殒落，甚至化为尘埃。曾几回首，若非毛泽东悍然发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戚本禹按部就班地发展，则必有另一番骄人的成绩，断不可能身陷囹圄十八年。历史的发展往往出人意料，命耶？运耶？历史应该怎样评价之？人们又从中汲取什么样的经验和教训呢？

一、青年时代：“八司马事件”因祸得福

戚本禹出生于1931年，祖籍山东省威海市。1942年随父亲到上海，随后进入国人在上海创办的南洋模范中学。在校期间接受了中共地下组织的影响，投身地下学生运动，1948年加入中共。1949年上海解放后被选送到北京中央团校的前身——劳动大学学习，因

其学习成绩好，理论水平较高，1950年5月4日被分配到中南海工作，时年仅19岁。

进入中南海后，戚本禹被分配到中央书记处政治秘书室工作，当时的秘书室主任为师哲，副主任江青和田家英。这个秘书室实乃毛泽东本人的秘书室，属中央办公厅编制。戚本禹刚开始在此作的工作是校对毛泽东选集1至3卷，戚本禹是田家英的助手，一篇毛选文章要逐字逐句地校对，往往要通读五六十遍，工作虽然乏味，但从此戚本禹对毛泽东著作颇为熟悉，了然于胸。

此后戚本禹在中共中央信访局工作，五十年代后期担任政治秘书室一科科长，行政十六级干部，主要负责处理毛泽东的来往信件，兼管来访接待工作。

1958年3月中南海发生了一起“八司马事件”，当时的中央政治秘书室开展整风活动，几位年轻的党员向政治秘书室副任何载提意见，这些人当中就有戚本禹。何载向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直机关党委书记杨尚昆报告，指责这些提意见者是向党发起进攻，于是组织政治秘书室的人们对这些人开展批判斗争，不仅要将这八个人停职反省，还要进一步揭发批判他们的反党问题。这个问题被反映到毛泽东处后，毛泽东改变了这一决定，毛说：想不到我的身边也发生了新的“八司马事件”。唐顺宗时期，柳宗元、刘禹锡、王叔文等8人实行变法改革，受到了大地主、大官僚的打击，被罢官、撤职，形成了历史上有名的‘八司马事件’。戚本禹这些人因为对中央办公厅和政治秘书室领导人的右倾错误有看法，提了一些批评意见，就要把人家打成‘反党’，简直是岂有此理！依我看，中直党委应该撤销，政治秘书室也要撤销，真正受到处分的不是林克、戚本禹这些人，而是整他们的人！当年5月初在毛泽东的干预下，戚本禹等人获得平反，而整人的干部如何载则被开除党籍下放劳动，中直机关党委也被撤销。对戚本禹而言，毛泽东对他简直就是恩同再造。

二、参与李秀成变节说的史学争鸣

天资聪颖的戚本禹业余时间喜好钻研历史，对中国近代史，特别是太平天国革命史尤感兴趣，花了大量时间研究太平天国忠王李秀成。由于中共建国后歌颂农民起义及其领袖，李秀成敢于揭杆起义造反，后又死于满清王朝的屠刀下，自然成为大陆史学界肯定的正面人物。李秀成死前曾留下了一份“自述”，明显表露出乞降求抚及苟且偷生之意，如何评价李秀成其人一度成为史学界有所争论的焦点。

1963年戚本禹撰文《评李秀成自述——并同罗尔纲、梁启超、吕集义等先生商榷》，投稿《历史研究》编辑部，为了深入探讨此一历史公案并引发百家争鸣的学术讨论，《历史研究》在当年第四期上予以全文发表。戚本禹在文章中指出李秀成的自述“是一个背叛太平天国革命事业的‘自白书’”。戚本禹认为，李秀成“在敌人俘虏以后丧失革命气节、背叛革命事业的事实，也是否认不了的。”，并指责李秀成美化敌人，丑化自己，戚本禹在文中还进一步分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英雄为什么会投降变节。此文一经发表立即在学术界引发了激烈的辩论，罗尔纲等人也先后撰文与戚本禹商榷。据戚本禹自己说，毛泽东后来看到戚本禹的文章，在刊有此文报纸空白处批了几字：白纸黑字，铁案如山，忠王不忠，不足为训。充分肯定了戚本禹一文。

历史事件本身就是错综复杂的，并非非黑即白那么简单，史学界对某个事件展开探讨、辩论原本就是极为正常的现象。姑且不论戚本禹文章是否真有道理，但他这种不囿前说，敢于提出不同观点本身还是值得提倡的，人们不应以后来戚本禹被当局打倒而全盘否定戚本禹的观点。然而，中国的史学研究往往受政治风向的干扰，史学研究者常常不得不保持政治上的正确，历史研究受到官方不同程度的干预，近现代史研究尤甚，如果官方肯定了的说法就可大行其道，而被否定了的观点，其研究者甚至就有可能被戴上“反动学术权威”、“反党分子”的帽子，这

就是中国学术之所以不昌的主要原因。事实上对李秀成的讨论已经超出了历史研究的范畴，戚本禹的文章已染上极左的色彩，批判李秀成的变节投降也成为中共日后抓叛徒的象征。文革中共将前领导人瞿秋白《我的自述》拿来狠批，周恩来更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周恩来是第一个在党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搞打砸抢，周的讲话后来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追踪溯源，不能不说这是受到六十年代批判李秀成投降变节的影响。

细审当年那段历史，毛泽东处心积虑发动一场大的运动，他更要强调全党对他保持一致，老干部老革命们都要紧跟毛泽东干革命，所以更要强调保持晚节，乃至周恩来在文革中反复向党的高级干部们强调“晚节不保，一笔勾销”。戚本禹的问题不在于他写了一篇史学商榷文章，而在于那时的史学研究也蒙上了一层极左的色彩，史学研究为当今政治服务，甚至可以成为打倒某些人的锐利武器，不同的观点可以被任意曲解为“向党猖狂进攻”，日后发生的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就是典型一例，史学界名人吴晗、翦伯赞也是死于这一莫须有的罪名。

三、出任中央文革小组成员

自从戚本禹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褒扬后，戚本禹名声大噪。1964年夏陈伯达将戚本禹戚本禹调到《红旗》杂志负责历史组的工作。《红旗》杂志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其编辑成员都是学有所长的理论学者，戚本禹如此年轻就迈上这一台阶，实属党内年轻俊彦，一时前途无量。

1965年底毛泽东下决心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江青在上海找了张春桥、姚文元秘密起草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并于1965年11月10日在上海《文汇报》上发表，从而点燃了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索。身为党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的编辑，戚本禹竟然丝毫不知此文的背景和来历。但是随后，戚本禹紧跟形势，在12月8日于《红旗》第12期上发表了《为革命研究历史》一文，对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翦伯赞的历史观进行不点名的批判。

1965年12月2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陈伯达、胡绳、艾思奇、关锋、和田家英谈话。毛泽东在这次谈话中首次就姚文元、戚本禹的文章明确表态，毛说：“戚本禹的文章很好，我看了三遍，缺点是没有点名。姚文元的文章也很好，对戏剧界、历史界、哲学界震动很大，缺点是没有击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一九五九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这是毛泽东发出的文革第一声战斗号令，表示出毛泽东对姚文元、戚本禹的大力支持，毛泽东的这一谈话使戚本禹名声大噪。有了毛泽东这个“尚方宝剑”，戚本禹先后写下了《翦伯赞同志的历史观点应当批判》，1966年3月15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又写了《〈海瑞骂皇帝〉和〈海瑞罢官〉的反动实质》，1966年4月2日发表在《人民日报》上，在这篇文章中，戚本禹指责吴晗“海瑞的宣传，是吴晗同志一系列反对马克思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理论宣传的一个尖端”，这种说法完全背离了历史事实，采取了扣帽子的上纲上线作法，与姚文元批吴晗的蛮不讲理、欲加之罪如出一辙。戚本禹再接再厉又写出了《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一文，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上，戚本禹将吴晗等人定性为：“邓拓、吴晗、廖沫沙等人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的反党事件”，该文随即在5月16日由《人民日报》转载，积极配合了毛泽东、江青打击党内彭罗陆杨的战役。由于戚本禹积极跟随毛泽东搞文革，1966年5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时，戚本禹被选为小组成员，排名在穆欣、姚文元之前。戚本禹一跃而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首长”，时年

戚本禹仅35岁，真是时势造英雄，一颗党内政治明星冉冉升起。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戚本禹向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学校师生、工矿企业工人、各地造反派组织等发表了大量的讲话，据不完全统计，从1966年5月到1967年12月之间，戚本禹就发表了大约1200余次左右的讲话。在这些讲话中，戚本禹大都秉承毛泽东、江青造反有理的精神，支持各地造反夺权运动，批判“走资派”。

四、有没有逼死田家英？

田家英是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主任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毛泽东的大秘书，但田家英却是文革开始后中南海里第一个自杀身亡的中共高级干部，后来一些公开出版物将田家英之死的责任归结到王力和戚本禹的头上，似乎是他们几个“坏人”将田家英活活逼死。然而，历史真是如此吗？谁应该为田家英之死负责呢？

1966年5月20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刘少奇主持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一个机构处理彭真、陆定一、杨尚昆、田家英的问题，组长是周恩来，下面还有分工，周恩来负责彭真案，陈伯达负责陆定一案，康生负责杨尚昆案，时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的安子文负责田家英案。周恩来召开会议统一布置分别与此四人谈话，收回他们的文件。安子文负责的小组成员有王力和戚本禹。5月22日下午3点，在田家英的中南海的住所，安子文代表中央对田家英宣布了中央的决定：第一，中央认为你和杨尚昆的关系不正常，杨尚昆已经被认定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你要就此作检查；第二，中央认为你一贯右倾，现在我代表中央宣布，你立即停职反省，交清你保管的全部文件，秘书室工作交给戚本禹负责。当天晚上，在中央办公厅的干部会议上，批判田家英的时候，他又被加上一条“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与此同时，汪东兴统一布置将一批人搬出中南海，其中就包括了田家英。23日田家英在家里愤而自缢身亡。

总的来看，田家英是死于毛泽东文化大革命的极左路线，毛泽东为了顺利发动文革，打倒一切他所认定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就要清除一切障碍，“彭罗陆杨”捎带上田家英等不过就是必须要被扫清的前沿阵地。具体而言，勒令田家英停职检查的上层决策来自刘少奇和周恩来，具体执行的人是时任中组部部长的安子文，王力和戚本禹不过就是安子文的跟班跑腿而已，他们当时根本就没有资格决定田家英的命运，田家英被逼而死的直接责任又岂能放在王力和戚本禹的头上？

五、戚本禹与打倒刘少奇

1967年3月30日《红旗》杂志发表了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评反动影片〈清宫秘史〉》，文章虽然没有直接点名，但读者一看就知道这是一篇将批判矛头直接对准刘少奇的文章。文章说：“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想的是资本主义，爱的是资本主义，讲的还是资本主义。他所贩卖的那一套人吃人的哲学，完全是为发展资本主义，维护血腥的剥削制度服务的。他的这种声音是吸血鬼和寄生虫们的声音，也是他自己那种肮脏的、丑恶的资产阶级灵魂的大暴露。……你根本不是什么“老革命”！你是假革命、反革命，你就是睡在我们身边的赫鲁晓夫！”戚本禹这篇文章当然没有任何可取之处，基本上就是乱扣帽子，乱打棍子，上纲上线，欲置刘少奇于死地。可是，戚本禹的这篇文章却得到毛泽东的赞赏和大力支持，1967年3月23日毛泽东在该文上作了批示和修改。毛泽东批示“戚本禹同志，看过，写得很好。有些小的修改，不知是否妥当，请你和同志们商量处理。”日后中共将该文作为证据，认定戚本禹犯了“反革命宣传煽动罪”和“诬告陷害罪”，但却不敢追究到毛泽东的头上。虽然在打倒的刘少奇这场斗争中，戚本禹扮演了极不光彩的角色，但是毛泽东才是整个事件的主角。

中共现在将打倒刘少奇的罪责仅仅归结到江青、康生、戚本禹等几个人头上显然也是不公正的。打倒刘少奇原本就是毛泽东发动文革最主要的原因，也是毛泽东的一项战略部署。中共中央在1966年5月发出的《五一六通知》中就已明确指出“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使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通知》中虽然并未指明谁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谁又是“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但是起草修改这个通知的毛泽东却心知肚明，只是倒刘战役必须一步步进行，笋也要一层层剥才行。1966年的下半年，毛泽东已经取得了文革的初步成果，揪出了“彭罗陆杨”等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但在毛泽东看来斗争才刚刚开始，最大的“走资派”还未最后揪出来，还要通过一系列的夺权斗争才能达到这个目的，所以就有了1966年12月26日毛泽东生日谈话，号召要搞“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从而引发了“上海一月夺权”风暴，全国其他地方的夺权也风起云涌。这股斗争的矛头必将引向毛泽东所认为的最大走资派——刘少奇。戚本禹只不过躬逢其盛，当了毛泽东倒刘的工具而已。戚本禹区区一个十六级干部，虽名列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却无决定权，只知要紧跟毛泽东，毛泽东想要打倒谁，戚本禹就毫不犹豫地积极响应。事实上，真正决定刘少奇命运，刘少奇被迫害致死的元凶正是毛泽东本人，江青、康生也就是个“从犯”，更不用提中央专案组的总负责周恩来所起的实际作用了。所以，戚本禹在这些共犯链条中实属行为最轻的。

六、戚本禹与打倒老干部

除了打倒刘少奇一事外，戚本禹还涉及了其他一些迫害老干部的问题，如揪斗彭德怀，打死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等。这些都成为戚本禹日后被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刑18年的依据。然而，戚本禹个人有权做这些事吗？

据中央文革小组另一个成员王力回忆说，戚本禹自己坦承到四川揪彭德怀回京实际上是中央开会作的决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参加者还有汪东兴、杨成武等人。后来将彭德怀交由群众批斗也是周恩来主持中央会议时作的决定，戚本禹不过就是一个执行者而已。王力判断说“我判断是专案组的会，专案组的会也是总理主持的。专案组就是办这种事的。揪人、批斗、关人都是专案组管的。”对于如何处理彭德怀这样的高级干部，戚本禹这样的小人物根本就没有资格插手。海外著名学者高文谦先生在《晚年周恩来》一书中对此有十分中肯的评论：“周恩来当时作为中央专案审查委员会主任，同时又是中央文革碰头会的牵头人，而且作为中共最资深的领导人之一，熟知党内各方的历史情况，因此对文革中搞的不少冤假错案都逃不脱干系，有的更负有重大责任。举其荦荦大者，像彭德怀、刘少奇、贺龙、彭真等人的专案，他都直接或间接分管过，指导专案的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高先生特别指出“文革期间，凡是逮捕人，都需要经过中央文革碰头会批准，大人物和北京的由碰头会直接管，各省市的也须上报备案。这些全都经过周恩来的手。”“作者曾接触过其中一部分专案审查材料，上面都有周的签名或批示，有的还作过多次批示，写了大段的批语，口气是很严厉的，笔下颇有绍兴师爷的遗风。”显然，揪斗彭德怀的决策绝非出自戚本禹，戚本禹无非就是扮演了打手的角色。至于批斗刘邓陶更是出自专案组的授意，区区一个戚本禹岂是台前的决策人？

原煤炭部部长张霖之是文革初期第一个被造反派酷刑致死的政府部长。作为造反派的组织者戚本禹对此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将张霖之定为煤炭部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却是出自毛泽东之口。1964年12月20日的中央会议上毛泽东与刘少奇就四清问题发生争执，刘少奇认为，四清运动中各种矛盾交叉在一起，很复杂，还是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就解决

什么矛盾，不能都上升为敌我矛盾，煤炭部谁是走资派呢？毛泽东张口就点了张霖之的名字，从此张霖之被上了走资派的黑名单。江青在1966年12月也点名张霖之是“彭真死党”。正因为有了毛泽东、江青的“尚方宝剑”，造反派有恃无恐地酷刑毒打张霖之，1967年1月22日张霖之竟然被造反派活活打死。显然造成张霖之之死的元凶就是毛泽东，戚本禹最多就是个从犯和打手。现在人们在追究文革责任时不应舍本而逐末，忘记掉文革元凶的罪责。这里值得一提的是，煤炭部长张霖之被造反派活活打死后，张的家属也遭株连迫害。林彪得知张霖之的死讯非常震惊，当主管国防科委的七机部部长王秉璋将军向林彪汇报工作时谈及张霖之之死（王秉璋与张霖之在解放战争中曾经是搭档，王是中原野战军十一纵队司令员，张是该纵队政委），林彪当场表态说：“张霖之是个好同志，他是让戚本禹那伙人害死的，戚本禹是刽子手！”张霖之在历史上与林彪素无渊源，但林彪却是文革中第一个明确指出中央文革那伙人是致张霖之不幸去世的凶手，并毫不隐讳地说出“张霖之是个好同志”的中央领导人。

七、戚本禹的倒台

戚本禹是文革初期跃升的一颗政治新星，然而，这颗新星却出人意料地迅速陨落。戚本禹为何会倒台？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对王力、关锋写的《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枪杆子——纪念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四十周年》的《红旗》杂志社论极为不满？亦或是毛泽东对王力、关锋和戚本禹等人大搞“揪军内一小撮”的反击，从而导致了王力和关锋的最先倒台，同时也牵连到戚本禹，最终导致了戚本禹的下台？

1967年是中央文革最嚣张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江青等极左派秉承毛泽东“全国全面阶级斗争”的最高指示，在全国掀起了夺权狂潮，先有上海的“一月风暴”，得到毛泽东事后的认可，随后全国上下全面夺权运动风起云涌，一发不可收拾，山西省、山东省、贵州省、黑龙江省紧跟而上，形成了全国夺权的第一个高潮。面对如此疯狂的运动，绝大多数人忧心忡忡，但是毛泽东却不以为然，毛泽东认为，只有天下大乱才能达到天下大治，牛鬼蛇神统统跑了出来，正好可以来个全国改天换地。然而，毛泽东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毛自以为自己的计划可以畅行无阻，没想到在武汉地区却碰了一个大钉子。武汉“七二〇事件”的爆发使毛泽东认识到，对军队的高干不能压迫太紧，否则就会激出意想不到的后果。面对这一形势，毛泽东不得不采取较为和缓的态度处理“七二〇事件”，事件的主角——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并未身陷囹圄，反而得到较为优厚的待遇，其他大军区的司令，如许世友、韩先楚等人被接到中南海，过上了几天舒适的生活，再也没有受到造反派的冲击。毛泽东不动声色地开始改变他的战略部署。军队要安定，军人要安抚，那些激起民愤的中央文革小组个别成员就成了毛泽东最先抛出的替罪羊。王力、关锋等人所写的文章其实无不是遵照毛泽东的指示，迅速传达毛泽东的声音，体现毛泽东和中央文革的精神实质，但此时，毛泽东抓住一个王力的“八七讲话”和所谓的“揪军内一小撮”大作文章，将它当成王力、关锋等人的罪状，一举将他们打倒。

王力和关锋倒台后，戚本禹也惶惶不可终日。1967年9月4日，戚本禹向毛泽东递交了他的检讨信。戚本禹在信中说，“关锋、王力犯了很严重的错误，表现形式是‘左’倾盲动。（一）错误地估计全国的形势，把斗争过程中的反复现象，看作是全国出现了资本主义复辟，看不到革命群众的斗争成果和力量。（二）错误地估计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报纸、电台到处号召抓“军内一小撮”。（三）怀疑一切，随便动摇毛主席司令部的领导。他们犯错误的思想根源是个人主义，自我膨胀，自以为了不起，比谁都革命，听不得不同意见。”戚本禹在信中还检讨说，“我对他们的有些问题察觉不出，王力在外交部问题上犯的错误的，就同我有关。我从心里愿意努力改造自己，永远做一个忠于毛泽东思想的小兵。”毛泽东则在信上批了几句不疼不痒的字“已阅，退戚本禹同志。犯些错误有益，可以引起深思，改正错误。便时，请你告知关、王二同志。”但是戚本禹最终还是没有逃过这场厄运。1968年初戚本禹终于也被迫“请假检讨”了。

事实证明，每当国内出现乱局，毛泽东就要抛出一些人予以打倒，将所有的坏事都推到这几个人头上，王力、关锋和戚本禹都是文革当中涌现的“小人物”，文革初期张牙舞爪得罪了不少人，他们的倒台不会影整个文革大局，对中央文革也不构成真正的威胁，反而使人们对中央文革的仇恨转移到这几个被打倒的人身上，既可及时扭转文革的乱局，又可迅速稳定军队平息人们的怒气，同时也保护了中央文革的其他几位大员们。

八、承担过重的罪名：身陷囹圄 18 年

1968 年 1 月 14 日被中央宣布“请假检讨”，实际上就是被“关押审查”了。随后，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成了真正的毛泽东的囚徒。关于戚本禹在秦城监狱的经历，现在披露甚少，外界几乎不知戚本禹是如何度过这些艰难的日子，也不知道戚本禹是否被提审，他的真实罪名又是什么。其实，戚本禹是毛泽东极左理论的忠实信徒，戚本禹做的每一件事都不是他自做主张而来，而是奉命行事，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革战略部署，所以，戚本禹被关进秦城监狱时，中共竟然说不出任何像样的罪名。

周恩来在 1970 年 1 月 24 日接见中直系统文化部教育部等单位的军宣队代表时说，“戚本禹是野心家，是跑腿的，活动能力很强。他无孔不钻，文化方面他钻的地方最多。江青同志不让他去，他硬要去。他还到煤炭部、化工部，工厂也到了，工厂到二七车辆厂、首钢。所以工业单位也要搞，文化方面他和体委的刘长信，卫生系统的孙正有来往。他两个儿子证明也不是好人，他能伸就伸，对样板戏也插手，乱改，特别是对交响音乐《沙家浜》和《白毛女》。杨成武那篇文章主席很不满意，大树特树不符合毛泽东思想，不能登出，但戚本禹一定要登。后来登在第二版上，杨成武还不满意。戚本禹道歉，王力还给送像章慰问。互相勾结，暗地活动，以后才揭发出来在中央办公厅有彭、陆、杨还有田家英、他完全是跟着田家英走的。田家英有很多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言论，派人搜他们的东西，别人的东西都收回来了，就田家英的没有收回来。有主席的手稿，丢了好多，是戚本禹串通的，第二天田就自杀灭口。戚本禹这个人写东西也是不能写的，过去我们也是受了骗的。《评忠王李秀成》那是根据主席思想，请历史研究所帮他写的，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这说明对一个人的认识是要经过相当一个时期考验的。经过考验知道戚本禹是这么一个人，他的根子是很深的。”

周恩来这番话可算是一个天下奇谈，显然它代表了中央对戚本禹的定论。但是通观这些所谓的罪状，没有一条是实事求是的。戚本禹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成员当然要到各个部委、机关、单位宣讲毛泽东思想，传达中央文革的指示；为杨成武所写的所谓“大树特树”文章也是奉命行事，由于没有刊登在《人民日报》的头版，而是放在第二版还引来杨成武的愤怒；至于戚本禹与田家英的关系更非如周恩来所言，毛泽东的手稿也从未听说有过丢失，戚本禹更不可能与田家英串通；那个《评忠王李秀成》也是戚本禹独自完成，绝无假历史研究所研究人员之手。可以说，周恩来是信口开河地胡乱给戚本禹定罪，这些罪名却没有一条能站得住脚。然而，戚本禹的罪名没有一条是“反党宣传”、“迫害老干部”，可见周恩来对此还是心中有数。而戚本禹最终还是由于这些莫名其妙的罪行身陷囹圄达 18 年之久。

1983 年 1 月 2 日，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诬告陷害罪和聚众‘打砸抢’罪”，判处戚本禹有期徒刑 18 年，剥夺政治权利 4 年。1986 年戚本禹才刑满释放。据说，戚本禹现在是某高科技公司的副董事长。戚本禹在文革初期虽然颇为嚣张，干了不少不得人心之事，但是，严格地看待这些罪名，这些罪名显然与事实不符。戚本禹文革当中宣传的显然是毛泽东的文革精神，戚本禹也绝没有本事独自诬告陷害那些中共的老干部，哪些老干部要被打倒，哪些老干部应该受到保护都在毛泽东、周恩来等人的一手操控之下，戚本禹最多就是一个“跑腿的”而已；至于“打砸抢”更是文革初期特有的特点，也不能完全归结于戚

本禹个人的作用。如果中共不能追究毛泽东的“反革命罪行”，中共又有什么理由给戚本禹定这些罪名呢？戚本禹为毛泽东的文革付出了高昂的代价，承担了过重的罪名，这些都是今人应该予以重新评价的。

九、文革反思：为毛泽东辩护不遗余力

文革对戚本禹而言真是一言难尽，不堪回首，但是戚本禹后来还是接受了一些人的访谈，道出了一些自己的文革所见所闻。那么出狱后的戚本禹对文革有什么反思吗？戚本禹对毛泽东仍然有着一份说不尽的感情。戚本禹自己承认，毛泽东既是他的恩师，也是他的克星。戚本禹进入中南海的前18年，得到了毛泽东的关怀和指导，但是戚本禹在此之后却在黑暗的监狱中虚度了18个春秋，用戚本禹自己的话说，相互扯平了，似乎谁也不欠谁了。然而，戚本禹的整个后半生都受到文革的影响，这能算扯平吗？此外，我们看到戚本禹就文革一事公开发表的见解还是不遗余力地为毛泽东作辩护。

1996年《明报月刊》第六期有一篇戚本禹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编辑陆源的访谈，其中涉及毛泽东私人医生李志绥对毛泽东的回忆和评价，戚本禹在此访谈中重点批驳了李志绥医生对毛泽东的评价。戚本禹说：“毛泽东何许人？他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成功地领导亿万农民最终推翻地主统治的伟大人物。他青年时即号‘农民王’，终其一生都造地主阶级的反，他是封建帝王的最大克星。是二千多年封建社会最大的造反派。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谬。说毛泽东‘专制独裁’，也是信口雌黄！”看了戚本禹这番大力维护毛泽东的言论，直让人回到了文革的年代，人们好像又一次听到了“东方红、太阳升”的歌曲，再次感受到“毛主席是全国人民大救星”的阿谀逢迎。毛泽东推翻了一个国民党政权不假，但是毛泽东却建立了一个比国民党还专制独裁的政权，文化革命更是登峰造极，将中国推进了黑暗的深渊。那时的中国可有任何言论的自由？可有任何民主与法制？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反党分子”，可以不经任何公检法机关就予以逮捕和关押，多少人被无辜迫害致死，多少人家破人亡，文革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灾难，戚本禹本人既是这场运动的参与者，同时也是受害者，戚本禹不也是被那些莫名其妙的罪名所打倒吗？回首文革，毛泽东带给中国人民的究竟是幸福还是苦难，中国社会究竟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中国变得更加光明还是更加黑暗，这些难道不是有目共睹吗？只有那些没有天地良心的人才会说出这种昏话。可惜的是，戚本禹并未从文革当中吸取教训，仍然怀念那个可憎可厌的时代，毫无廉耻地为毛泽东歌功颂德，这就是戚本禹的悲哀。对于李志绥书中描述的毛泽东玩弄女人，戚本禹也矢口否认。殊不知老毛玩女人乃尽人皆知之事，并非仅仅一个李志绥医生的揭露，戚本禹的否认只能更加令人所不齿。毛泽东的时代早已过去了，且一去不复返，虽然现在的中国依然是共产党一党专制，没有什么实质上的改变，但是中国终将走上民主自由的道路，终将彻底清算毛泽东。

十、晚年戚本禹：昧着良心说瞎话

戚本禹的一生可说是起伏跌宕，既经历了光芒耀眼的时代，也度过了黑暗低谷的人生。戚本禹少年得志，青年猖狂，中年失意，老年沉寂，是那时代很有代表性的人物。严格说来，戚本禹还算不上真正的知识分子，戚本禹虽然天份不错，也很刻苦用功，在史学领域初露一点头角，但是这份对历史的钻研尚属“初级阶段”，且这份研究并未使戚本禹转变成为一介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戚本禹将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投入到中共极左的阶级斗争当中，史学研究不是为了探讨历史事件，而是成为打倒毛泽东政敌的武器，这种研究充其量也就是曲学阿世，充当毛泽东的御用文人。更何况，随着戚本禹地位的上升，史学研究对戚本禹而言早已丧失了它的本来意义，写作大批判的理论文章成为戚本禹的主要任务。

文革中的戚本禹既谈不上是个文人，离政治家也还有十万八千里，为毛泽东、江青当“御

前行”也显得“嫩”了点，过分的投入导致戚本禹得意忘形，从而铸下了自己倒台的命运。其实，戚本禹在一开始就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绑在毛泽东的战车上，一切惟毛泽东马首是瞻，以毛泽东的是非为真理和对错，从而成为积极推行毛泽东极左路线的干将，毛泽东的极左政策带给中国人民无穷的灾难，戚本禹又岂能逃脱历史的审判？只不过邓小平时代还要为尊者讳，还要尽力洗刷毛泽东的罪恶，那么戚本禹就成为现成的替罪羊。虽然，我们不必过于苛责戚本禹，但是我们不得不指出戚本禹实在缺乏对历史以及对自己的反省，人们看到的戚本禹仍然无视事实，继续为毛泽东歌功颂德。仅此一点戚本禹就远远不如王力，甚至还不如关锋，关锋至少闭口不言，却还没有昧着良心说瞎话。戚本禹对文革和毛泽东如此地反省和认识，又岂能得到人们的宽恕和谅解！

□ 原载《北京之春》2009年第7期（本文发表时注释从略）

~~~~~

### 【不堪回首】

#### 邓拓自杀前的抗争

• 钱 江 •

1966年5月16日《人民日报》在1版下半版通栏刊登了（转2版整个上版）戚本禹的“大批判”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文章点名说：“邓拓是一个什么人？现在已经查明，他是一个叛徒。在抗日战争时期又混入党内。他伪装积极，骗取党和人民的信任，担任了人民日报社的重要职务。他经常利用自己的职权，歪曲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推行和宣传他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1957年夏天，他是资产阶级右派方面一个摇鹅毛扇的人物。”

经历过波澜起伏的党内斗争，又担任过人民日报社总编辑和社长的邓拓，当然懂得这篇文章的“定性”含义，明了文中杀机。在整个国家滑向疯狂的“文革”轨道之时，戚本禹深有背景的点名批判文章必然是杀身之祸的前奏。

邓拓疲惫了，戚文的发表使他失去了最后的精神依托。

自从姚文元关于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来，邓拓竭力抗争，期望挽回颓局。现在看来，所有的努力都不会奏效了。

早在1965年11月底北京各大报转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之后，邓拓在北京市委的会议上几次表态说：“这次讨论，要在学术界造成一个好的风气。就是真正照《北京日报》‘编者按’那样搞，贯彻‘双百’方针，实事求是地辨明是非。文章要以理服人，不要以势取胜。要让人家说话，不要一边倒。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过火的批评要纠正，不能一棍子将人打死。”11月30日，邓拓召开高等院校会议，布置对姚文的讨论，要求以《北京日报》按语为准，展开学术讨论。

他哪里知道，布置这些事务，是他一生工作的终点。

#### ◇ 从《燕山夜话》到《三家村札记》

回首往事，早在1958年8月，邓拓就被批准离开人民日报，但交接工作却是到1959年2月才完成的。人民日报编辑为此举行全体人员大会，为邓拓送别。面对满场同事，邓拓

吟咏了自己充满激情的古典诗《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

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  
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  
屈指当知功与过，关心最是后争先。  
平生赢得豪情在，举国高潮望接天。

从1949年7月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到1959年2月离去，10年风雨同舟，他和人民日报有着特殊的感情。即使此时离开，又怎能断得了他和人民日报千丝万缕的联系。

1957年4月，毛泽东当面斥责邓拓，1958年3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又一次以批评那篇“反冒进”社论为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点名批判邓拓。从南宁回到北京，邓拓即正式递交了自己的辞职报告。

对邓拓的境遇，他在战争年代的老首长彭真很了解，也很同情，通过中组部把他调到了北京市委，任书记处书记。这时，北京市委正好要办一个理论刊物，需要有人来负责，邓拓就是彭真想到的理想人选。1958年7月14日，彭真听取北京市委宣传部关于办刊和刊名的报告，他当场说：“邓拓来了就好办了。”

由彭真安排，邓拓于1959年2月到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分管文教。依照分工，按说邓拓应该负责《北京日报》，但这样一来就会和他原先工作的《人民日报》发生密切的关系，颇有微妙之处。因此彭真将《北京日报》的工作划归郑天翔负责。而北京市委的书记们都很尊重邓拓，知道他是办报行家，所以有关《北京日报》的事情经常与邓拓沟通。

从1961年起，中央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纠正“大跃进”的一些错误做法。对这些实事求是的方针，邓拓积极拥护。年初的1月11日，北京日报社长范瑾传达了邓拓关于报纸宣传的一段讲话，大意是要提倡读书，报纸要多发一些古人发愤图强、发愤读书的故事。这是与提倡人们与灾难斗争有关的。

听到这番讲话后，《北京晚报》编辑找到邓拓，请他给晚报写文章。邓拓答应在晚报“五色土”副刊开设《燕山夜话》专栏，并于1961年3月19日刊登了第一篇文章《生命的三分之一》，倡导读书之风。

《燕山夜话》受到了读者欢迎，使得《前线》杂志编辑不甘落后，他们认为邓拓是《前线》主编，更应给本刊写稿，于是多次提出，请他在《前线》开设专栏。邓拓有心答应，又觉得靠一个人写稿恐误了编辑截稿期，就提出请人合作，结果将市委统战部长廖沫沙和副市长吴晗拉着一起上马了。

1961年9月20日，邓拓、吴晗、廖沫沙在四川饭店吃饭，一边商议为《前线》写稿。邓拓提议，3个人合开杂文专栏，就叫“三家村”。于是起了“三家村札记”这个俏皮名字。

关于署名，邓拓提出效仿“马铁丁”，参与者从每人名字中取一个字。在场者都同意，吴晗取吴字，邓拓笔名马南村，取一南字，廖沫沙取一沙字，叫“吴南沙”。后来廖提出用他的笔名“繁星”的星字，遂定名为吴南星。三是约定文章以《前线》杂志的一个页码为准，千字文，题目自选，每期一篇，轮流撰稿。他们当场指定李筠为《三家村札记》的稿件联系人。

《三家村札记》从1961年出刊到1964年停刊，总共刊登了198篇文章（其中有

5篇不是邓、廖、吴写的)。在这期间，邓拓之所以能够连续写作《燕山夜话》和参与写作《三家村札记》，很重要的条件是，1962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后，党内民主空气有所发扬。但是到了60年代中期，随着中苏论战愈演愈烈，国内“抓阶级斗争”的空气越来越浓，活跃的思想气氛逐渐消失。反映活跃思想的《三家村札记》首当其冲地受到了怀疑。

1963年3月，中共中央批转了文化部党组关于停演“鬼戏”的报告。5月，江青到上海，在柯庆施支持下组织批判戏剧《李慧娘》的文章，廖沫沙发表在《北京晚报》上的文章《有鬼无害论》即受到批判。这是对“三家村”的当头一棒。廖沫沙不得不在北京市委统战部内作了检讨。1965年2月18日，廖沫沙的检讨刊登在《北京晚报》上。当时彭真认为，用这种方式就可以为廖沫沙“还账”了，他表态说：“廖沫沙关于《有鬼无害论》的检查作得不错，别人要再扭住不放，就是对方的问题了。”廖沫沙作了这番表态后，就到北京郊区搞“四清”去了。

吴晗感到环境险恶，给邓拓写信说题目难找，工作也忙，建议不再参加“三家村”写文章了。邓拓、廖沫沙心照不宣，表示同意。《三家村札记》在最后一篇《遇难而进》的文章中落下了帷幕。

#### ◇ 抵制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

1964年8月，中共华北局在北戴河会议召开会议，决定发表批评吴晗有关“道德继承”的文章。李筠接到彭真、刘仁从北戴河打来的电话指示，赶到那里去写批判文章。同时，刘仁和邓拓电招吴晗去北戴河写检讨。

李筠的文章写完，由邓拓修改定稿，将文章定题为《无产阶级对剥削阶级的道德是革命呢，还是继承？——就“道德继承论”与吴南星同志商榷》，署名金世伟（北京市委的谐音），前面还加了编者按。编者按说：金世伟同志的这篇文章，针对吴南星同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了原则性的严肃批评。我们认为这是一场很有意义的争论。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发表于本刊“三家村札记”栏内。“三家村札记”是杂文专栏，由几位作者轮流撰写，均署名吴南星。现在看来，我们当时采取这种做法本身就不妥当，因为实际上文章既非集体创作，而作者意见又非完全一致。吴南星同志的《说道德》和《再说道德》两篇文章是经过本刊编辑部看了的。我们当时对于剥削阶级的道德，没有从“革命呢还是继承呢”这个根本问题上加以考虑。对于吴南星同志的文章只是做了一些枝节的修改，就同意发表了。这是原则性的错误。同时，在原则性问题上做了无原则的迁就，也是错误的。

这篇文章后来并没有发表，其原因至今还是未解之谜，只能说有一场更大的灾难在等待吴晗和邓拓了。

在廖沫沙、吴晗先后被罗织罪名之际，邓拓这边亦是潮生浪涌。姚文元文章发表后的1965年11月13日，邓拓召集范瑾、李琪、李筠商议对策。邓拓在商议中说：“不知吴晗反应如何？”说罢，他操起电话给吴晗打了过去，问道：“你看了文章，怎么样？”

吴晗委屈地说：要是学术问题，我可以跟他辩论。他扣政治帽子，这是陷害。我1959年写的文章，怎么知道1961年有“单干风”？

放下电话，邓拓认为吴晗讲的有道理，他含糊地说，听说《海瑞罢官》同彭德怀问题有联系，不知是真是假，咱们也不摸底。

这次的会议决定,《前线》和《北京日报》开展学术批判。结果文章还没有写出来,眼看到了11月底,形势急转直下,拒载姚文已不可能。这时,彭真仍然力图把批判控制在学术范围之内。

11月28日,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召集会议,布置转载姚文。他一边布置,不由地感叹了一句:“吴晗在解放前从事民主斗争。”

在彭真身边的邓拓马上就说:“根据吴晗的表现,还不能说他是反党反社会主义,不能一棍子打死。这是真的,不能糊弄人家。”

1965年12月2日,邓拓、范瑾召集《北京日报》、《前线》学术批判小组人员开会,传达市委的态度。邓拓说:对这次争论,要有个基本态度。他解释《解放军报》、《人民日报》、《北京日报》3个按语的不同之处说:《解放军报》按语鲜明,是因为军队内部不搞百家争鸣和学术讨论。但是现在吴晗的问题不是已有了结论,不是已肯定《海瑞罢官》是一株大毒草,不是一批判《海瑞罢官》,吴晗也罢官。吴晗本来不是写戏的,别人请他写,但写着写着就陷进去了,就自比海瑞,就像郭老自比蔡文姬,孟超自比李慧娘一样。李慧娘确实是骂贾似道的。吴晗的问题看发展,将来发展到什么程度再说。

邓拓说,现在首先当学术问题来讨论。要培养一个良好的风气,先当学术问题来搞,即便是政治问题处理起来也比较稳当。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要分开,如果一下分不清,就先当学术问题来处理。要把不好的风气扭过来,当然,姚文元提出政治问题也不能回避。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都有发言权,不是一批评就不得了,就有覆灭的危险,就不能工作了。批评是为了更好地工作,过火的批评也应纠正,不能一棍子打死。现在首先要缓和这个局面,应该有人写文章。肯定姚文元的文章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过火;吴晗哪些地方是对的,哪些地方确实错了。这场学术界的大辩论不可避免,它牵扯到历史人物评价问题、道德观点评价。

邓拓提出,研究《海瑞罢官》,大家可以研究剧本本身的问题,材料观点都要站得住,姚文元的引文就有毛病。吴晗讲他1959年写《论海瑞》,是反右倾机会主义的。后来马连良请他写剧本,改了7稿,1961年8月8日定的稿。同年上演,演到1962年8月。他原来题目是写海瑞,第四稿才改为《海瑞罢官》,是大家提了意见才改的。

邓拓的意见得到彭真的支持。12月初,彭真指示邓拓写一篇批判吴晗的文章。邓拓即要李筠把前面提到的被按下不表的“金世伟”文章拿出来参考。因为有这个基础,邓拓新文章出得很快,题目叫《从〈海瑞罢官〉谈到“道德继承论”——就几个理论问题与吴晗同志商榷》,署名赵凯。文前加《前线》编者按语说,赵凯同志这篇文章,从吴晗同志新编的历史剧《海瑞罢官》问题谈到他的道德继承论的若干基本观点,提出了原则性的不同意见,与吴晗同志商榷。赵凯同志把“道德继承论”和海瑞罢官联系起来讨论,我们赞成这样做。希望读者根据“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热烈参加海瑞罢官问题的讨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其他有关问题的讨论,使我们的科学艺术得到进一步的发展……这条按语的其他内容与金世伟文的按语基本相同。

邓拓把文章送交彭真,彭真认为太简单了,需要再改。邓拓重新改写后,经市委书记们传阅,彭真定稿,署名“向阳生”,12月12日在《前线》、《北京日报》以显着的地位同时发表。这篇文章以学术讨论的语气,对吴晗的道德继承论提出不同意见。发表时原文的编者按删去不用。

向阳生文章发表后第二天,根据北京市委的基本调子,《北京日报》刊出了李筠写的《对待

〈海瑞罢官〉能操两可吗？》。12月25日，《前线》又发表李筠署名为艾力耘的文章《以革命的批判精神评价历史人物》。继续强调在“百家争鸣”的方针下看待“海瑞罢官”。

赶写向阳生文章的同时，邓拓根据彭真的指示，写信给吴晗，让他迅速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检查。信中说：“你的思想问题，恐怕主要的还是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根本问题没有弄清楚”，“你的文章无论是自我批评或者对姚文元文章的批评意见，我们认为都应该充分发表，不要顾虑重重。”

听取了邓拓的意见，吴晗即写出《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一文，就有关事实和历史依据问题进行说明和解释，表明《海》剧与“单干风”、“翻案风”无关。但在某些问题上，他违心地承认了错误。吴晗的检查刊发在12月27日的《北京日报》上。

出于自身经历和经验，邓拓已感到姚文元文章的复杂性。1965年12月19日，在《前线》组长会上，邓拓指出，海瑞问题的文章不止一个人写过，早在1959年《解放日报》就发表过蒋星煜的《南包公海瑞》，并有编者按语，说海瑞的故事流传很广，这个人一不为名，二不为利，把海瑞吹捧了一番。姚文发表后，《文汇报》重新登出了蒋文，但没有同时刊载《解放日报》当年的编者按。邓拓很有怀疑地说，要批判就都批判，现在发表蒋文，却留了一手自己的按语，这里可能有名堂。

会议之后，邓拓让李筠向吴晗查询蒋星煜是什么人，并示意可以让吴晗的秘书写个“读者来信”寄《文汇报》，质问《解放日报》发表过吹捧海瑞的文章，为什么不先检查自己就批评别人。但这个事还没有落实，局面就变得更加不可收拾了。

1966年1月16日，许立群召集北京6个报刊编辑部会议，仍在把对姚文的讨论控制在学术范畴里。许立群说：“按规定，有关的批判文章，要送到中宣部办公室。”参加会议的李筠根据邓拓的授意发言说：我们没有计划卷入这个讨论。《前线》篇幅有限，当前工作很多要宣传，要面向工农兵，搞通俗化，我们已刊载了3篇文章，主要是还账，因为我们过去发表了两说道德。我们的文章引出了吴晗的自我批评，使大家有了批判的靶子。以后如果有对吴晗问题政治性结论文章，我们转载。

#### ◇ 由“向阳生”引发的冲突

1966年2月3日，彭真主持召开“5人小组”扩大会议，拟定了《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但就在这期间，发生了一件邓拓意想不到的事情，过去与邓拓并不熟悉的关锋突然夜访邓拓，作了交谈。第二天邓拓告诉李筠，此前康生打电话给他，说关锋对“向阳生”的文章有意见，你们可以约个时间谈谈。

关锋随即就来了，对邓拓说，向阳生的文章没有谈及政治，实际上是为吴晗开脱。特别是你，同吴晗一起写过文章，这样做不恰当。吴晗讲继承忠孝等不是抽象的，有其具体内容，讲孝是骂我们的。关锋还提了一些和邓拓不同的意见。

邓拓对关锋说，《北京日报》不是我管的，我写向阳生这篇文章，原来曾想在文章中作些检查。邓拓对关锋特别声明：这件事彭真没有管。对于关锋的指责，邓拓说：我不是没有谈到政治问题，文章末尾是谈了的。

后来邓拓告诉李筠，关锋那天还对他说了不少吹捧的好话。在暴风雨来临的前夕，康生派人来谈话用意何在？邓拓没有猜透。

接着，事态严重恶化了，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在杭州同康生、江青等人作了3次谈话，指责北京市委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他还宣称，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并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指彭真）。毛泽东还点名批评《三家村札记》和《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这就为邓拓定下了大罪，在当时是无法解脱的。

4月6日至4月11日，在刘仁、万里、郑天翔“三人领导小组”和李琪、宋硕、范瑾、张文松组成的“四人办公室”的主持下，《北京晚报》、《北京日报》、《前线》、北京出版社、高教局、教育局、文化局等单位，在市委交际处对邓拓进行了一次批判，主要是对邓拓提出问题，结论是“邓拓是拥护三面红旗的，在顶单干风、自由市场等方面同书记处是一致的”。“邓拓除《三家村札记》外，其他文章都是正确的”。但从这天起，邓拓停止工作，专事检查。

北京市委已保不住邓拓了。非但如此，还要组织对邓拓的批判。

1966年4月16日，《北京日报》以3个版篇幅，在《关于“三家村”和〈燕山夜话〉的批判》标题下，发表了批判邓拓等人的文章。

倒是彭真在这批材料刊出后亲自给邓拓打来电话，劝他不要紧张，要正确对待，严格要求自己，还劝邓拓保重身体，注意健康，将来还要做很多工作。

刘仁也派人专门来安慰邓拓，让他冷静对待。

前任北京市委宣传部长杨述来看望了邓拓，谈及眼前风云，两人心情都很沉重。邓拓说：“我做了一年以后再弄清问题的准备。”杨述摇摇头：“我看这一次可能会长些，可能需要两三年吧。”可惜，这场民族浩劫席卷中国竟达10年之久。

对邓拓的批判急速升温。5月8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了江青亲自组织、署名“高炬”的文章《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点明邓拓“为资产阶级复辟鸣锣开道”，指责《燕山夜话》“是地地道道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

同日，关锋化名何明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擦亮眼睛，辨别真假》，同高炬文章唱一个调子，都是针对4月16日《北京日报》对“三家村”的批判的。文章说，《前线》、《北京日报》批“三家村”是假批判，说“邓拓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三家村’的一名‘村长’”。这篇文章事先曾交毛泽东审阅，毛泽东表态说：“何明的文章我看过，我是喜欢的。”

上海《解放日报》和《文汇报》同时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三家村”——〈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的反动本质》，第二天全国各大报转载。文章说，邓拓、吴晗、廖沫沙以“三家村”为名写文章是“经过精心策划的，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一场反社会主义大进攻”，要揪其“指示”、“支持”、“吹捧”者，挖出“最深的根子”。

邓拓完全失去了争辩的权利，只能默默接受屈辱。

#### ◇ 对邓拓的最后一击

1966年5月16日，“5·16通知”被通过，标志着为害中国10年之久的“文化革命”正式开始了，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从此身陷囹圄。就在这一天，包括《人民日

报》在内的全国各大报纸同时转载戚本禹发表在《红旗》杂志第7期的文章《评〈前线〉、〈北京日报〉的资产阶级立场》。戚本禹的文章实际上为邓拓的问题定了调子，这样的大案没有相当长的年头是变不了的。以“反右”为例，当时已经10年过去，“右派分子”的处境比以前更加困难。

读到戚本禹的文章，邓拓终于下定决心，告别人间，告别即将扑向身来的苦难。

5月17日晚上，支走了妻子和孩子，邓拓伏案疾书直到深夜。

第一封信，他写给彭真、刘仁和市委同事：

……尽管在这个斗争中，我已经变成众矢之的，全国范围的批判运动正在胜利发展，人们一致声讨《燕山夜话》和“三家村”的“黑帮”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但是，我一直努力带着当前的问题进一步学习毛主席著作，要想跟上革命形势的发展。……

许多工农兵作者都说：“听了广播，看了报上刊登的邓拓一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话，气愤极了。”我完全懂得他们的心情。我对于所有批评我的人绝无半点怨言。只要对党对革命事业有利，我个人无论经受任何痛苦和牺牲，我都甘心情愿。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永远是这样。……

文章的含意究竟如何，我希望组织上指定若干人作一番考核。《燕山夜话》和《三家村札记》中，我写的文章合计一百七十一篇，有问题的是多少篇？是什么性质的问题？我相信这是客观存在，一定会搞清楚的。

邓拓以较长篇幅在信中详细叙述了他历史上两次被捕和出狱的情况，他申诉说：因此，我不认为自己是“混进党内，伪装积极，骗取了党和人民的信任”，我认为自己一直是在党的领导下，为革命事业而不顾一切地在努力奋斗。

邓拓在这封篇幅相当长的遗书中最后写道：

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本应该在这一场大革命中经得起严峻的考验。遗憾的是我近来旧病都发作了，再拖下去徒然给党和人民增加负担。但是，我的这一颗心永远是向着敬爱的党，向着敬爱的毛主席。当我要离开你们的时候。让我再一次高呼：

伟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万岁！

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胜利万岁！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全世界的胜利万岁！

邓拓

一九六六年五月十七日

他于5月17日深夜或18日凌晨自杀，以死来做最后的抗争。更加充满悲剧意味的是，他在绝命书中反复书写“万岁”的口号，仿佛置身于封建王朝的阴森殿堂。

写完给彭真、刘仁的长篇遗书，时间可能已经进入5月18日的凌晨。天亮后，任何不测都可能发生，时间已经不多了。用这最后的短暂时间，邓拓给妻子丁一岚写短信诀别。

当年在抗日敌后根据地与年轻的丁一岚相识相恋，邓拓是何等灿烂情怀，写过不少耐人寻

味的优美诗章。但是，最后面向死神匆匆走去的时候，他已经没有时间措词于诗词了，亦可以看出邓拓决心赴死何等急切。

一岚：  
我因为赶写了一封长信给市委，来不及给你们写信。此刻心脏跳动很不规律，肠疾又在纠缠，不多写了。

你们永远不要想起我，永远忘掉我吧。我害得你们够苦了，今后你们永远解除了我所给予你们的精神创伤。

永别了，亲爱的。

写下这些文字后，邓拓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时年54岁

（作者为《人民日报》海外版副总编辑）

□ 《世纪》2009年第2期  
~~~~~

【口述历史】

“文革”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 王宇英 •

摘要：到目前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一些成绩，挽救了很多“活”史料，拓宽了资料搜集的范围，写作过程也比较严谨。但是，这项工作仍存在一些不足，尤其是理论与实践相对脱节，例如名实不符、视角单一、缺乏研究意识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必须在加强“文革”口述史理论建构的基础上，在实践过程中切实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研究者与当事人互动性强、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可以互证的长处。

关键词：“文革”；口述史；理论与实践

一、成绩与不足

目前已经出版的“文革”口述史著作，大部分是以人物为中心(1)，也有少部分以事件为中心(2)。综观这些著作，成绩是主要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1．挽救了一部分“活”史料

到2006年，“文革”开始已有40年，结束也已经30年，曾经亲身经历过“文革”的人（一般来说，1966年应在13岁以上）大部分已经或是即将步入老年，如果不抓紧时间记录和整理有关“文革”的口述史料，那么，随着这些人的逐渐离去，势必会留下永久的遗憾。正如《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的“出版说明”所指出的：“他们年事已高，自己动手困难，访谈并整理他们的口述，成为十分紧迫而带有抢救性的工作。”例如，“文革”时期风华正茂的浩然，由于中风，到郑实为其采写口述自传的时候，不但已经不能续写其第四、第五部自传体小说，甚至已经“无法长篇大论地讲故事”，还常常因为想不起当事人姓名而陷入长时间的沉默中（1）（p．356）。在这种情况下，26万字的《我的人生：浩然口述自传》一书就显得

格外重要，史料价值也相当高。

2. 资料搜集较为全面

口述史著作的访谈范围往往比较广泛，例如《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不仅访谈周扬，还采访了夏衍、名乙、于伶、萧乾、吴祖光、张光年、林默涵、李之琰、梅志、贾植芳、陈明、丁一岚、王力等，这些人“或是友人，或是亲属，或是同事，或是部下，或是宿敌”（2）（p. 331）；采访对象的全面性，使得这本口述史著作持中而不偏颇，成为各方当事人都比较认同的一本好书。《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也是如此，“本书的回忆由三部分组成：一是家属的回忆；二是老舍生前所在单位北京市文联和文化局当事人的回忆；三是其他与此事件相关的当事人的回忆”。访谈对象不仅有老舍的亲朋好友，也有当事人，如草明、浩然、侯文正、郝希如，甚至包括当时在场的一个人女红卫兵（3）（p. 2, p. 7）。在做口述访谈的过程中，往往还会有文献史料的收获，如舒乙、林斤澜、柯兴、侯文正都同意将自己的材料和文章收入该书，萧军的女儿萧群还将其父从未面世的两篇珍贵史料交给采访者，供其使用。

3. 写作过程比较严谨

以《中国知青口述史》为例，作者的工作分几个步骤：第一步是根据对象拟定采访大纲，进行实地采访；第二步是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第三步是对原始稿进行加工，“因为受访者的文化水平、表述能力相差很大，叙述重复、时间倒置、记忆错误之处在所难免，所以，这一步的工作就是：在尽量保证口述原汁原味的前提下，对它做必要的整理，包括：文字上的修改和次序上的调整；史实的核对和简单注释；对全文作分段处理，加小标题和提要；为了阅读上的便利，还删去了访谈时的全部问话和插话”；第四步则是“把初步修订稿与本人核实，做必要的补充修改，撰写采访前记，在此基础上形成定稿”（4）（pp. 8—9）。

写作过程往往是艰苦的。沈国凡在谈到他采访王文正，写作《共和国大审判：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一书时说：“每写一段文字，我都要反复地查看王老提供的原始资料。为了史料的真实性，一些重要的地方，我都请王老以亲历者的身份提供了书面的文字。书稿完成后，又打印出来请王老核对，逐一地过目，并得到他的确认和肯定。”（5）（p. 317）

总而言之，迄今为止，“文革”口述史工作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但是与此同时，这项工作中也存在一些不足之处，最为明显的就是实践与理论的脱节：

1. 混淆回忆录与口述史，名实不符的现象较为突出

关于什么是口述史，学术界存在两种看法。一种强调研究者的作用，认为口述历史必须建筑在对访谈资料深入的考证与研究之上；如果缺乏访谈者的研究加工，不仅亲历者和知情者的单纯口述史料不能成为“口述历史”，即便受访者和访谈者的对话记录也不能算是口述历史。持这种看法的学者较多。钟少华认为：“口述历史是受访者与历史工作者合作的产物，利用人类特有的语言，利用科技设备，双方合作谈话的录音都是口述史料，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稿，再经研究加工，可以写成各种口述历史专著。”（6）（p. 414）杨祥银也认为，口述史学是“对口述史料进行的历史学分支学科”（7）（p. 38）。另一种看法认为，口述史是分层次的，不仅包括经过访谈者考证加工的口述历史著作，还包括口述形式的回忆录与自传，以及建立在访谈者与受访人对话基础上的访谈录。杨立文认为：“口述历史最基本的含义，是相对于文字资料而言，就是收集当事人或知情人的口头资料。它的基本方法就是调查访问，采用口述手记的方式收集资料，经与文字档案核实，整理成为文字稿。”（8）（p. 120）但即使从第二种较为宽容的看法来看，口述史也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回忆录。“从内容上来说，口述历史主要是

指亲历者或知情者自己写作的历史回忆录，但又有别于回忆录，它是由历史研究工作者和爱好者在采访当事人的基础上，经过一定稽核的史实记录。”（9）（p. 236）

但是，在当前的“文革”口述史领域，将回忆录与口述史混为一谈的现象却较为普遍。例如《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一书，虽以“口述实录”命名，却“主要选材于已公开出版或发表过的回忆录和具有研究性质的回忆文章”（10）（p. 1）；甚至就连当代中国出版社推出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也是“有些亲历者可以自己动手撰写，有些亲历者生前对其亲人讲述过自己所亲历的事件或与一些要人交往的情形，其亲人以回忆的形式述出。很显然，这些记述都是十分宝贵的当代中国史资料，因此，我们也将它们收入这套丛书中”。笔者认为，即使为了保存史料，也不能将亲历者自己动手撰写的回忆录列入口述史范畴，这不仅是不严谨的，而且对口述历史的长远发展也是不利的。

2. 视角单一，采访对象侧重于政治人物及精英人物

由当事人口述、研究者笔录的口述史方法，使得访谈对象更加多样化，最大限度地赋予底层民众阐释自身历史的权利。“在更多的时候，它所关注的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数，是普通人的日常生活”（11）（p. 121）。但是当前的“文革”口述史却未能充分发扬这一优点，仍将访谈对象主要定位于政治人物及精英人物。以“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丛书为例，虽然开宗明义即指出，采访对象既可以是党政各级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也可以是普通老百姓，工、农、兵、学、商都可以成为该丛书的作者；但是从该系列已出版的五本著作来看，口述者分别是汪东兴、吴德、汪文风、师哲、王文正，没有一位是“普通老百姓”。

不可否认，曾经参与重大事件决策的领导干部、精英人物的记忆对“文革”史研究“有着特别重大的意义”。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这类人物由于社会地位特殊，文化水平较高，因此对他们来说，口述史并不是自我表达的主要渠道。正如舒芜所说：“本来，我平生经历中稍稍有点意思的，大概都写过回忆文章了，这里实在没有多少新材料。于是以意为之地发挥‘口述’二字的特点，散漫谈之。”（12）（p. 1）另一方面，这些人物在“文革”时期大多遭受过迫害和不公平待遇，访谈过于集中于这些人，不利于克服当前“文革”口述史实践中过于浓厚的悲情色彩，使人们一提到“文革”，就联想到政治运动的血雨腥风和社会状况的混乱无序。事实上，“文革”不仅包括1966～1969年极其严重的政治动乱时期，也包括此后的调整及相对稳定阶段；不仅出现了大量非法迫害、关押、虐待、驱逐现象，也存在吃喝用度等正常生活。正如姚力指出的，我们不应“大肆炒作”“文化大革命”的“凄惨往事”，以至于“将口述史与野史秘闻相等同”，“这种对口述史的误解和误导，不但违背了历史学给人以知识和智慧、服务于民族和国家大义的基本原则，也使口述史变成了商业营利的工具和别有用心者的枪口”（13）（p. 99）。

3. 缺乏研究意识，深度利用不足

口述史料与口述历史是不同的。“口述史料，是从史料学的角度，特指史料留存的一个种类；口述历史，是从历史学的角度，特指表述历史的一个方式”；而口述历史，“从它的功用来看，它不仅仅限于提供种种研究历史的素材，而且着重于以自己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14）（p. 98～99，p. 105）。因此，一般的访谈资料还不能称之为口述历史，“访谈录不同于口述史。因为口述史是在对相当数量的访谈录进行研究的基础上，对一定的历史问题给予实事求是的说明，并给予本质上的解释和对其规律的揭示。这不是访谈录所能解决的，而要靠史学工作者的研究来完成”；“口述历史是历史研究过程后的成果，一般的采访而形成的采访录是采访后的记录，它只是口述历史研究的资料而已”（15）（p. 91～92）。

然而，目前的“文革”口述史著作，大都是加了前言和后记的访谈资料集。口述者的回忆与叙述占了主要位置，访谈者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是虚置的，其作用主要体现在确定主题、圈定范围及提炼内容、安排结构、剪裁材料等前、后期工作上。正如许福芦总结的：“先录音，大体由我按照预设的目标提一个框架式的主题”；“而后从盒带上扒出文字，再行整理。所谓‘整理’，不过是材料取舍、稍加结构而已。初稿我是用方格纸抄出来的”；“于是先生就动笔作些增删，我再把增删稿打印出来，还请先生看，又有小的增删，如此再三。我的任务除了体力劳动之外，主要精力放在结构和语言上面”（12）（pp. 378~379）。

当前“文革”口述史再现与揭示的历史事实，往往在文献史料中已经多有涉及，未能充分做到以其“独有的方式阐释历史”。实际上，“文革”史中还有许多问题是现有文献史料所未曾触及的，亟待我们研究。从宽度上看，“文革”期间的婚姻、家庭、性伦、生活方式、人际关系、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文化传播和娱乐休闲的方式，以及体育、艺术等等相关问题的探讨还极为不够。从深度上看，“文革”期间一个重要特点是：国家意识形态大力强调阶级斗争，同时借助个人崇拜不断开展群众性政治运动；但是这些斗争和运动的影响范围、程度、方式到底怎样？具有不同文化理念和人格结构的普通人群对上层意志的响应度到底有多大？这些传统文献史料所不足以支撑的领域，才更应该是口述历史发挥其自身价值的地方。与此同时，强调对口述史料的二次挖掘与深度利用，也在于记忆的不可靠性本身就包含一定的历史内容，蕴含着一定的历史含义。因为根据口述人在口述过程中的特有的行为，例如有意或无意的隐瞒、曲解等等，我们可以分析人们的价值观念、精神状态的发展史与转变史。

二、遵循规范与发挥优势

当前的“文革”口述史还处于起步阶段。我们认为，在今后的实践过程中，应该严格遵循口述历史的相关要求与规范，充分发挥口述历史的优势，为“文革”口述史的良性发展打下坚实基础。

1. 充分发挥口述史史料来源广泛多样的优点

首先，口述史的访谈对象应该来自社会不同阶层，既有重要历史事件或重大历史活动的亲历者或目击者，也应该包括更广泛的群体——那些不能或不愿采用书写手段表达自己的群体；虽然没有政治决策权，但这个群体对于社会政治也有自己的认识，而且他们的认识以及行动直接影响着政策能否执行、执行得怎样；他们的生活、感受与评判，同样应该是“文革”史研究不可忽略的内容。

其次，不能满足于口述史料“量”的增加，更要注重“质”的丰富性与多样性。“文革”牵涉整个中国社会，对它的研究应该是多角度、多层面的；其中既有封建主义的个人崇拜，也有建设社会主义的政治热情；既有对个人利益受损的不满，也有身不由己随波逐流；既有实实在在的利己驱使，也有无私无畏的信仰追求。在搜集口述史料时，要关注不同层次的问题。

总之，口述史的一个重要价值即在于：它同时可以具有多重关照意义。在进行“文革”口述史研究时，我们既要关注整体的政治—经济结构，也要重视微观的个案研究；要突破“以政治和精英人物为中心”的传统模式，拓展视野，增加层面，真正实现“文革”口述史研究的多样化。

2. 充分发挥口述史研究者与口述者互动性强的优点

口述史是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互动过程，这种互动有助于打破个人封闭的思维空间

和话语空间，不仅可以促使口述者追溯、挖掘已经淡忘和丢失的记忆，更有意义的是，还可以促使口述者和研究者增加反思的角度及层面，对双方原有的思维架构和认知内容产生校正作用（16）。可以说，口述史最主要的优点就在于历史认识主体（包括研究者与口述者）的共同参与与密切合作。

研究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协助口述人确保口述史料的真实性。虽然大部分口述者能够做到不故意歪曲史实，如同萧乾先生所说的：“快90岁的人了，也没有什么好怕的。一生所经历的坎坷沧桑，是非曲直，也没什么可遮掩的……这里，我向世人交代了自己的一生。”（17）但是在口述过程中，仍然会出现讹漏、遮掩、美化或丑化等等偏离史实之处。正如郑实、傅光明所遭遇到的：“相互矛盾的叙述反而使我们手足无措，有时甚至是瞠目结舌，并不遥远的事件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显然，事隔多年，人们已经按照自己的想象和主观意愿重新组合、编排、过滤了历史。”（3）（p. 4）这是因为“文革”口述史有其特殊性。在动乱年代，很多人因为种种原因做了与道德标准相悖的事情，虽然事过多年，一些口述者仍不能或不愿坦诚面对当时自己的错误作为，加之人们在感情体验上更容易记住被害而不是加害的经验，所以难免产生偏离史实、回忆失真之类问题。这就需要训练有素的研究者在扎实的专业素养基础上，运用成熟的采访技巧，小心谨慎地加以规避、提醒、引导和纠正。

研究者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在最大程度地保证真实性的同时，从搜集到的口述史料中整理和发掘出更深层次的价值。人总是在个体差异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互动过程中有计划、有选择地决定个体的行为表现，不同的人受个人经历及性格特征的影响，面对的社会状况、拥有的社会机会和受到的社会限制是不同的，所以口述史料往往是个人的、感性的、零碎的，这就要求研究者在搜集“文革”时期口述史料时，既要充分尊重口述者的表达权力，又要避免“量”的重复，从实现社会历史、社会结构背景与个人生命史相结合的高度，发现口述史料中具有整体特征的、典型的、规律性的东西，使搜集到的史料能够全面、准确地展示历史的多个侧面和整体演进过程。

3. 充分发挥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的优点

强调口述史料与文献史料互证，是为了更加全面、准确地反映历史。优秀的口述史著作决不会是访谈资料的单纯堆砌。曾经成功地为胡适、李宗仁撰写口述自传的唐德刚先生认为：“所谓口述历史并不是一个人讲一个人写就能完成的”；“大学者的口述史料大概有百分之五十、六十；非学术人士的口述史料只有百分之十五、二十左右……”（14）（p. 105）至于他写的《胡适口述自传》，“胡先生的口述只占百分之五十，另百分之五十要我自己找材料加以印证补充。写‘李宗仁口述历史’更麻烦，因为李先生是军人，他连写封信都要秘书，口述时也随便讲讲，我必须细心的找资料去编、去写、去考证”（18）（p. 2）。目前面世的“文革”口述史著作也有文献史料与口述史料互证的意识，但参考范围往往比较狭窄，有时仅仅局限于口述者提供的部分文件。我们认为，研究者不仅需要收集、阅读、甄别相关的日记、书信、回忆录、档案、报刊、传记等等，也要关注已有的研究成果。在此基础上，如果访谈对象较多、口述史料较为丰富，还要注意口述史料与口述史料之间的互证、补充与订正研究。

总之，口述历史的研究过程是一个研究者与受访者共同参与的过程，也是访谈工作和研究工作相互结合、不断深化的过程。将口述方法引入“文革”史研究，最根本的目的就在于：通过挖掘更多的史料，更为全面、准确、深入地认识“文革”，最大限度地实现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多重关照意义。

参考文献：

- (1) 郑实. 我的人生: 浩然口述自传 (M). 北京: 华艺出版社, 2000.
- (2) 李辉. 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1998.
- (3) 郑实, 傅光明. 太平湖的记忆: 老舍之死 (M). 深圳: 海天出版社, 2001.
- (4) 刘小萌. 中国知青口述史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4.
- (5) 沈国凡采写, 王文正口述. 共和国大审判: 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亲历记 (M). 北京: 当代中国出版社, 2006.
- (6) 钟少华. 进取集——钟少华文存 (C). 北京: 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 1998.
- (7) 杨祥银. 试论口述史学的功用和困难 (J). 史学理论研究, 2000, (3).
- (8) 杨立文. 论口述史学在历史学中的功用和地位 (A). 北大史学 1 (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 (9) 虞和平. 重视口述历史研究繁荣和发展历史科学 (A). 周新国. 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0) 鲁林, 卫华, 王刚. 中国共产党口述实录 (M). 济南: 济南出版社, 2002.
- (11) 熊卫民. 口述史的特点: 功能与局限性 (A). 周新国. 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2) 舒芜口述, 许福芦撰写. 舒芜口述自传 (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 (13) 姚力. 我国口述史学发展的困难与前景 (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05, (1).
- (14) 荣维木. 关于口述历史研究中的概念界定 (A). 周新国. 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5) 梁景和. 关于口述史的思考 (A). 周新国. 中国口述史的理论与实践 (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
- (16) 李小江. 让女人自己说话·总序 (M). 北京: 三联书店, 2003.
- (17) 傅光明采访整理, 萧乾口述. 风雨平生——萧乾口述自传. 自序 (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9.
- (18) 唐德刚. 史学与文学 (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9.

(1)如李辉主编的《摇荡的秋千——是是非非说周扬》，贺黎、杨健主编的《无罪流放——66位知识分子“五·七”于校告白》，郑实、傅光明主编的《太平湖的记忆——老舍之死》，《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等著作。还有一些关于知青群体的口述史著作，如刘中陆主编的《青春方程式：五十个北京女知青的自述》，王江主编的《劫后辉煌——在磨难中崛起的知青老三届共和国第三代人》，以及刘小萌的《中国知青口述史》等。

(2)如当代中国出版社的“当代中国口述史”系列，包括汪文风的《从“童怀周”到审江青》、《汪东兴回忆：毛泽东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王文正口述的《共和国大审判》等。

□ 《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第1期

本期编辑：《华夏文摘》执行编辑：《CND》总编：
胡海科（美国） 思语（美国） 陈天寒（美国）
国际统一刊号 ISSN 1021-8602

投稿专用地址: tougao@cnd.org 其它事项请电邮: cnd-cm@cnd.org
如需有关《CND》和《华夏文摘》各种免费期刊和服务的信息，获取
中文文件: hwxz-info@cnd.org 英文文件: cnd-info@cnd.org
《华夏文摘》万维网服务站 (WWW) 地址: <http://www.cnd.org/>
